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七六期 ——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1 2 a)

【亡灵祭坛】关于另一类受难者的思考	周孜仁
【史海钩沉】文革中广西武斗二三事	韩 辛
【往事追忆】内战和上山下乡	徐友渔
【理论探索】从“湖南农民运动”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许向阳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 t t p : / / W w w . c n d . o r g / c r](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 u b j e c t 中标明 C R 字样。

【亡灵祭坛】

关于另一类受难者的思考
• 周孜仁 •

—

如果狭义地讲，我以为王友琴女士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一文中的定义，即那场通常被人简单地称为“浩劫”的政治运动，对人的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是1966年8月，因“红卫兵”组织的兴起而紧随出现的所谓“破四旧运动”，另一次是1968年到1969年，所谓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建立和巩固过程中，横行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种提法，是适宜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作为政治家们为实现特定的目的（这些目的常常十分隐秘、同时常常又是以十分神圣的外衣包裹的）而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把群众动员起来参与撕斗，其触及面之深广，其时间之漫长，其死难者之众多，其情状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不能不说是极为罕见了。它的受难者，就远远不止于王文中提到的、死于那两次迫害高潮的教师们、文艺家们、科学家们和其他才华横溢的社会精英。他们诚然是文革的受难者，但却不是全部，如果就数量而言，他们仅仅是受难者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极小一部份。而更多的，同样以其他的、各种各样让人无法忘记甚至不堪回忆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有工人、平民、学生，有的甚至是尚未成年、或者刚刚成年的少男少女。他们没有被尊敬过，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阅历，而他们恰恰是企图为国家和民族创造奇迹和功勋的人。他们正是怀揣着在壮丽革命背景下创造一段让人羡慕的个人历史，而愚蠢地、真诚地，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死亡。这一大批人，也应属于文革的受难者。

和列名于“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的死难者当然不一样——他们的受难和死亡，是在一种完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发生的，就象被纳粹党徒赶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样无能为力——而后一种死者，他们的受难和他们的死亡，却发生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境况之下。走向死亡之前，他们常常自己手中就握着武器，而胸中则是一腔壮烈之情。他们是很轻松的，就象去参加一场事关国家荣誉的足球赛。重庆一位大学生，我的同学，董继平，在1967年8月的一次枪战中，因为钢盔掉落，于是一粒子弹便从他的脑颅斜穿而过，但他没有死，甚至没有成为植物人，经过相当时间的治疗，他活下来了，会吃饭、会发一些简单的音，甚至可以在同学的搀扶下蹒跚学步。开始还好，同学们还在校，还能随时对他喂食，帮助他解便和洗澡，后来毕业分配，人去楼空，他的境况就很凄凉了。尤其糟糕的是，后来，他竟开始恢复了记忆！分配外地的同学回校看他，他竟然会傻傻地说：家里还有老母亲啊！等我毕业寄钱啊！当时学校能支付给他的生活费，每月就十五元钱！说着还会流泪。后来，他终于被遣送回乡，而同学们都在天南地北为自己的命运奔忙，他也就被慢慢忘却了。直到去年，我到四川省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县城公差，这才知道，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他，只能靠乞讨和拣拾垃圾堆里的食物为生，最后，不知什么时间，他终于倒在岷江支流那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默默死去而无人知晓。还有一为同学，李盛品，我至今保存着他死前给女友的信件副本。这封信是武斗刚开始时写的，来不及寄出他便死了。他到一个据他说“比较危险的”地区参加武斗。那时使用的是自制手榴弹，因为毫无制造经验，产品引爆时间普遍偏长：这在战场上是很危险的。为了控制质量，他在试验地让大家散开，自个儿拉掉引信，然后将手榴弹握在手上测算投弹的最佳延迟时间。万万没想到，他试验的这一棵引爆时间恰恰很短：他粉身碎骨了。在那封没来得及发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若有什么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诉家里人，如果我妈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会再活下去了。你若有空，希到我家去玩，以免除家里人的怀疑。他们若问到我，你可编些话来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要先想好。你得消息后，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只希你不要伤心过度就行了，不要影响身体健康，要想开些，我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我想，你只要想到这一点，可能心里就会开朗些。”同学们感动于他的赤诚，在连天炮火中把他母亲和女友从遥远的山区接来了学校。当时我曾赶去看了，老母亲扑在桌上痛哭不止，整整一个下午没抬起过头：我只能看见一部散乱的苍苍白发，那么耀眼，那么摄人心魄

！1967年7、8、9月的大武斗，当时曾经被人非常罗曼蒂克地称为“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如果我们今天能再翻开当时的小报，在那些连篇累牍的“死难烈士万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之类标题下，我们会轻而易举地找出一大串类似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疯狂、愚蠢、辛酸和永无止境的悲哀。

像董继平、李盛品这样死于战乱的牺牲品到底有多少呢？现在当然没有人能去作出准确的统计。在重庆沙坪坝公园的后面，至今保存着一片被称为可能是全中国唯一的“文革死难者墓群”（它的被保存是很偶然的，其原因甚至有点莫名其妙），有民间史家到这片被尘封于喧嚣闹市中的荒林野冢去做过详细考察，抄录了每一墓碑碑文，对每一墓葬的位置画了示意图，并对一些墓主亲属作过采访。据统计，埋在地下的死者数为433。这仅仅是小小的沙坪坝！那么整个重庆呢？整个四川省呢？整个中国呢？可以断言，如果将来某一天，这个数字被统计出来，那将多么地触目惊心！如果对死者的父母、亲人、同学都做一次采访，同样可以肯定，他们在从容献身的壮丽后面，留下了多少撕心裂肺的悲苦！

毫无疑问，他们也是文革的受难者。他们不应该被忘记。而且，他们的死是显得那么地多义，甚至过于复杂和畸形，所以记录、研究他们的死，除了表示对他们生命的尊重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更能找出文革的悲剧性所在。

二

几乎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生当然不是偶然的，绝非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戴着红袖标振臂一呼，四面八方即刻便呼啦啦冒出了那么多其貌狰狞的异形凶鬼。文革前的十七年，搞过那么多政治运动，推行过那么多成熟与不成熟、矛盾与不矛盾的、让人目不暇接的政策、法规、条例，整过那么多该整和不该整的人，遗留下需要调整的矛盾已经堆积太多，需要宣泄的情绪已经壅塞太多，需要疏导的恩怨已经沉淀太多：领导与领导的、派系与派系的、单位与单位的、个人与个人的、领导与百姓的，百姓与百姓的……从鸡毛蒜皮到生杀予夺。这些，都需要平衡，需要协商和调整。毛泽东只不过出人意表地交给他们一个舞台，同时交给他们一套政治斗争的武器，于是一夜之间，恩怨被挑开，情绪被激化，矛盾被加剧，八亿人都成了批判家，全都跳到台上来，热闹非凡地撕打开了。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而这场大戏剧的冲锋队员，毫无疑问该由年轻人来担当了。他们天真无邪，绝无个人恩怨和人生阅历可言，从60年代初开始的日复一日的反修大辩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让他们对毛的崇拜强化到了类乎宗教迷信般的虔诚。对于拯救正在堕落的世界的使命感，以及对假想敌的刻骨仇恨——所有这些，对于煽动他们像敢死队一样去大闹天宫甚至从容赴死，已经绰绰有余。我还得谈谈上面说到的董继平。他从死亡阴影下走出后的第一句话，竟是：“毛主席万岁！”那时，他刚刚能够发一些简单的元音！而我，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保存着他当时写下的歪歪斜斜的“XXX 好得很”。XXX是他参加的造反派组

织的番号。60年代有一位在海战中被国民党子弹击穿脑颅的解放军战士，名唤麦贤德，该麦在苏醒后的第一句话也是：“毛主席万岁。”此后的好一段时间，董便被同学们非常尊敬但毫无实际价值地称为“我们身边的麦贤德”。还有那位李盛品，他给女友的遗书里另有这么一段：“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祖国的前途，一切所谓什么个人的前途都是骗人的……阶级敌人随时都在梦想变天，我们怎能睡大觉？……现在的问题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夭折的问题。毛主席早已下了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现在是决战时刻，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不怕牺牲。”他给他挚爱的女友的最后祝福是：“祝你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学生们对领袖、对信念的真诚可见一斑了。甚至在董继平、李盛品们死去一年以后，许多人早已开始对那场没完没了的争斗感到厌倦不堪的时候，重庆市还在继续发生同样的故事。下面是一位当时的中学生叙述的1968年夏天的经历：

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200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3天3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70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4个，还有7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任何理论，不管多高超的、甚至是革命的理论，一旦演化成了一种教义，对这种教义的迷信，必然导致对生命本身的蔑视。如果我们没有工夫去深究“文化大革命”过于复杂的来龙去脉，仅仅谈到这些为数不少的受难者的死因，对自身生命的淡漠，当是最直接的杀手了。

三

中国古代哲人对人死亡的意义曾作过这样的界定：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实在不愿意用这两个完全对立的表述对上述年轻受难者的死亡作出评价。但我们知道，当他们的真诚被欺骗和愚弄，相应的结果必然是更多人对信念的失落。如果从现在算来，他们告别人生的时间不过短短三十多年，可拜物主义已经多么可怕、多么轻而易举地便改变了当今中国的价值观和社会风尚！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因为文化革命而带来的信念迷失，显然为这种社会巨变铺平了道路。让我们这些尚不算衰老的过来人，切切地有两世为人之感。

如果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也许这些正是伟大的历史进步。而从道德的角度来加以评价，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正如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用残酷的阶级剥削代替了人类童年期的和谐与平等，可我们还是只能说社会进步了。很多事情，它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就是如此荒唐地南辕北辙。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只是问题一回到我们冤死的年轻朋友身上，事情又总让人难以顺气。他们通过死亡所表现出来的信念、无私、勇气和英雄主义，不正是从他们光荣的前辈：从董存瑞到雷锋、从刘胡兰到江竹筠那儿一脉相承的吗？而所有这些，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们对他们多年教导的结果。事实上，直到今天，领导中国人民开创新时代的政治家们，依然在用同样的榜样谆谆教导着同样正在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既然如此，为什么对60年代末期那些年轻的受难者们要如此讳莫如深呢？即使在某些电影、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中他们偶有出现，也总要让他们显得可怕而又滑稽。更别说那些已被挖掉，早就无影无踪的久远亡灵了！

200多年前，清王朝极盛之时，它的第四个皇帝乾隆曾敕令修史。满族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明臣洪承畴、吴三桂开门揖敌，为虎作伥，替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这位乾隆爷偏偏不赏脸，不仅没让二人列入开国元勋的金榜，反倒在《贰臣传》中将洪名列卷首，而吴三桂，干脆打入《叛臣传》，同样位居卷首。这位明智的封建政治家非常清楚，从王朝的长远利益计，除了局部的和暂时的功利，于其上，还有更重要、更为恒久的东西，那就是道德基准和信念。他非常明白，如果让洪、吴这样的人誉登元勋，配享太庙，那么企图背叛新王朝的人就获得了理论根据。封建帝王既然如此，那么，200年后的今天，正在雄心勃勃建设泱泱大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们，为何要对忠于他们所提倡的信念的死者讳莫如深？

幸运的是，死去的毕竟是少数。没有死去的、死者的同学和朋友们，在看过了太多的鲜血和死亡、在经历了太多的煎熬和折难之后，以和平年代不可能有的速度，成熟了。他们已和过去大不相同。他们变得独立而成熟，不再盲从，不再为某一个人的权威所左右。就在极“左”权贵们还肆虐中国的70年代，白智清和李一哲的大字报，以及天安门广场的诗抄已如潜流般肆流全国，这便是标志。该政治家来面临自己种下的苦果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如麦加朝圣一般，流着热泪向他们欢呼的人，又在同一个地方，用诗歌对他们冷嘲热讽。深重的灾难成全了这个国家。我们的民族更成熟了。我们不想自欺欺人，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叙述，不正是这许多无辜的受难者（包括我们说到的前一种受难者和后一种受难者）的死亡，为我们导出的积极后果吗？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权利对这些灾难的受难者冷漠如斯。正如对待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动荡，我们不应该轻松地骂一句“浩劫”，或者叹一声“悲剧”便扬长而去。

四

对于前一种受难者，除了人不可能复活之外，人们还能为他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作为补偿，比如：政治上的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比如，发还没收的财产和补发工资，给家属子女优厚的安排等等。那么对于后一种受难者，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平反吗？谁曾把他们打成过反革命呢？没有。追认他们一个什么吗，比如烈士、因公殉职什么的？这更是无稽之谈。他们是怀着“捍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保卫党中央”的虔诚，甚至高呼着“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走向战场，慷慨赴死的。现在，难道能让躺在纪念堂里安详地接受顶礼膜拜的领袖来

为他们说点什么吗？当然不可能。

在他们血肉模糊的尸体下葬的时候，曾经接受过人们悲壮的敬意，不少情况下还鸣枪，让当时非常紧缺的子弹在天空炸出一片惊心动魄的乱响来为他们送行。经济条件宽裕的单位，还给他们修过不算寒碜的烈士墓或者陵园。不过这和死者的所谓英雄事迹一样，仅仅是过眼烟云而已。没过多久，在毛泽东时代被打倒和羞辱过的当权者重掌权柄，出于可以理解的常人心理，他们当然不愿意让这些长满青草的土堆以及与此相关的难堪历史留在那儿撩动他们十分脆弱的神经，于是就开始“消除文化革命痕迹”。连毛泽东的塑像他们都要推倒呢，这些小娃娃的坟还留下何用？于是挖了。挖个寸草不留。挖个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据说重庆沙坪坝公园后边因为种种莫名其妙原因而幸存下来的唯一的一片乱葬岗，现在被称为“文革死难者墓群”的，也只有一片自生自灭的荒藤蔓草，忠实卫护着400多具默默无闻的冤魂，只是种种号召他们献身的诗句，在爬满苍苔的断碣残碑上还莘莘可辩。据说，清明节、春节，还有其他一些节日，现在都会有人前去祭扫，烧纸，还供奉一些点心和蔬果，算是对死者，也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点安慰吧。

和其他更广阔的地区相比，埋葬在这片荒园下的死者当是幸运了。四川省有个“武装支泸”，双方死者数百，当初，坟莹们沿着长江两岸垒垒排开，很壮观的。而现在呢，在浩浩江流和苍烟落照之间，他们早已荡然无存。我的母校重庆大学松林坡上，掩映的密林深处的31位同学的墓地也早已无影无踪。连祭奠的地方都找不到。

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在网上为他们开辟一块墓园呢？不是为歌颂他们虚妄的崇高，不是为嘲笑他们的无知和愚昧。什么都不为。仅仅因为他们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充满困惑充满争斗充满陷阱同时又充满了阳光和希望的世界上来走过一遭。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 2001 / 10 / 17

~~~~~

【史海钩沉】

文革中广西武斗二三事

• 韩 辛 •

（一）概况

一九六七年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成为两大派：造反派（南宁422，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和桂林老多）和保皇派（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和桂林联指）。造反派要打韦国清保伍晋南，保皇派要保韦国清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两派打的不可开交，四次闹到周恩来总理那里，要周总理公断谁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一第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相安无事。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周总理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纪要”迅速传达到广西基层，造反派欢欣鼓舞，保皇派垂头丧气。第二天天刚亮，在保皇派占优势的工厂单位支左的驻军代表纷纷打起背包回军待命。保皇派的广

大群众因此忧心忡忡，许多人退出联指，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此后两派武斗迅速升级。

一九六八年夏，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随后周总理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广西两派武斗的“七三布告。”命令广西两派在24小时内向当地驻军部队交枪，超过24小时由解放军强行缴械。驻军派出直升飞机在广西各地空投散发七三布告。此后几天是广西武斗以来死人最多的最残酷的。南宁422和柳州造反大军被定为反革命组织，联指大报其仇。造反派大小头目包括扛50多群众被杀被关。剩下的群众是连踢带打没好日子过，只能夹著尾巴做人。桂林“老多”因没挑起武斗，勉强给算了个群众组织。保皇派广西联指大获全胜一统天下。

要想理解广西武斗的结局，就得说一说造反派要打倒的广西区党委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韦国清还是毛头小子的时候就跟著韦拔群在广西东兰县闹革命。后来邓小平到广西百色策动武装起义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七军，韦国清就在红七军当个排长什么的。红军长征经过黔桂边区，韦国清就跟著红七军加入了长征的队伍。建国后五八年广西撤省建壮族自治区（后来改傣族为壮族），韦国清接替李井泉出任区党委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虽然主政几年政绩平平，但韦国清可是广西驻军的老首长了，再加上那时候的老百姓都听共产党的话。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有这一段你就知道为什么解放军支左就是支联指，两派交枪就只是造反派交枪，顽抗者格杀勿论。

## （二）南宁

如今南宁许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六八年“七三布告”公布后解放军攻打自治区展览馆，清剿422反革命组织，和后来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了南宁城的事。

可这大洪水从何处来？却是极少人知道的秘密。南宁两派武斗打的很凶，把朝阳路从市百货大楼到邕江桥头的半条街烧了个精光，好几千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了保护自治区党政领导，区党委大院的围墙上拉上铁丝网架起机关枪。把冲著大门口的喷水池都改建成了碉堡。造反派422占了区展览馆，把它建成了武装根据地。

可要守住若大的展览馆，少说也得一二百人才行。七三布告一公布，南宁警备区司令部迅速派出部队，在联指的配合下把展览馆团团围住。解放军架上高音喇叭向里面宣读七三布告，勒令422反革命份子立即交枪投降，不要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自取灭亡。里面的人一听都傻了眼了，几个月前周总理还说咱是革命造反派，怎么一转眼就变成反革命份子了。往外面一瞧，除了解放军外还有持枪荷弹的联指，都不知道怎么办好。24小时一到，解放军开始进攻了。里面绝大多数的人只想暂时躲起来，找个机会溜出去。但也有少数不怕死的，跟解放军干上了，打死打伤六名（？）解放军战士。可打死了解放军战士这反革命的帽子就算戴牢了。几小时以后，解放军攻占了展览馆，在联指的大力协助下击毙了不少反革命份子。可大多数的422群众都躲到展览馆地下的人防工事里去了。

那年头美帝国主义正在轰炸越南，南宁是革命大后方的最前线，因此市里修建了不少人防工事，尤其是区展览馆这样的大建筑底下。4 2 2 在地道里准备了大量的乾粮和水，据说够几百人坚持一个月没问题。人防工事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正当广西军区领导头痛的时候，南宁下起大雨来。据说上游雨下的更大，邕江水位看涨。但住在江边，邕江水哪年不涨几回？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可六八年的大水却邪门，一夜之间竟把南宁城除了公园里的古炮台外都给淹了。可以想象那百来号躲在地道里的人的下场。几天后大水退了，解放军从展览馆地下的人防工事里清理出许许多多发臭的尸体。南宁市武斗到此宣告结束，随后成立了以联指和解放军为主的“革命委员会”。

关于南宁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许多人都认为是4 2 2 作恶多端，天怒人怨的结果。时间一长，人们也就淡忘了。可联指一统天下大获全胜的结局给广西文革后期带来了许多后遗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重新出山，拨乱反正清理文革遗留问题。全国各省市纷纷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广西自治区的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却难产迟迟开不了，原因是区市两级中联指出身的干部从中作梗，极力反对为文革中参加造反派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的群众平反。七九年（？）区第四届人大好不容易召开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怎样评价周总理在广西文革中应负的责任。

由于周总理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此事只能不了了之。值得一提的是大会其间特地从某地农村赶来了的一位不速之客给大会提供的一份爆炸性的材料，揭示了六八年南宁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的源头。来人是复了员的前解放军某部工兵排排长，七三布告后的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他奉命率领工兵排在邕江上游炸毁了一座大水库的拦水大坝。当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炸坝。（值得一提是邕江下游还有一座低水头的西津水电站。）大会文件发到代表手中，一个个看的目瞪口呆，大会要求严格保密。与此事有牵连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刘重桂因此下了台。

### （三）柳州

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武斗阶段，柳州各群众组织开始打造长矛大刀。各单位大门口都有手持红樱枪人站岗放哨。与此同时各群众组织为了占一个能用来开会作指挥中心的据点开始较量实力。柳州市武斗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柳州建筑公司青年工人邓顺成。事件的起因是造反大军的柳建，木材厂和酒厂的战斗队看中了木材厂的大礼堂，想占为自己的据点。突然发兵占了大礼堂，并立刻封了门窗严加防范，静待联指反击。大礼堂分上下两层各有人员把守，人人佩戴识别袖标，每日更换口令。

联指闻讯立调兵员把大礼堂团团围住。因为用的是长矛大刀，联指一时拿不出什么进攻的好主意。到了半夜，把守楼上的邓顺成和一个同伴溜到下面想看个究竟。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口令，一下没反应过来，冷冰冰的长矛就捅进了喉咙。外面情况不明，没人敢开门送他到医院。一夜流血过多，天没亮邓顺成小命就没了。第二天一大早，解放军赶来调解劝说两派各自收兵。



第二年春天，柳州两派武斗逐步升级越演越烈，所用武器不断更新换代。从原来的木棍狼牙棒到长矛大刀，到了最后干脆到各地驻军军营把步枪机枪高射炮都“搬”了出来。说是“搬”而不是“抢”自然是有道理的。造反派第一次到当地驻军的一个军械库抢枪，就因不听鸣枪警告，当场被驻军开枪打死了三个。解放军把“革命群众”打死了可不是一件小事。事情闹大了，广西军区下令不准随便开枪。胆大的再来抢枪的时候，解放军就站在一边看。绿灯一开，几天之内当地的驻军都被缴了械。X月，造反大军由柳铁工机联作内线，在柳州南站一次抢了八个车皮的援越军列，全是清一色的全自动步枪和大批弹药。自此柳州市武斗进入白炽化的阶段。两派武斗大战之前有一特殊事件值得一提。飞鹅路中段有个3—4层楼的延安旅社，不营业了给红卫兵占了当据点。能时为准备武斗，红卫兵不知从能里弄来好几箱炸药，都堆在一楼。一天夜里炸药突然爆炸，把大楼给炸塌了一半，死了不少红卫兵。死者中有个名叫小六子的初中生，那年才十五岁。炸药爆炸原因不明，有人说是抽烟不小心引爆炸药，也有人说是联指暗算。

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剑平是柳州工程机械厂工人（六八年底被逮捕）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为扩大造反大军的势力范围，一手策划了柳州市武斗的“三大战役”：攻打柳铁文化宫，市水厂，和市印染厂。这三个地方原来都是联指的地盘。造反大军为从联指手上夺过这些地盘，从各单位的战斗队调来几百人来攻打。联指也从各单位的战斗队调来几百人打保卫战打反攻。这样大规模的武斗一打就是好几天，双方都有重大伤亡。联指在“水厂保卫战”中死的人最多，因为水厂位于柳江河北岸，是保卫柳北“大后方”的前沿阵地。

造反大军武器上占优势，联指吃了不少亏。联指也抢部队的枪，可地方部队的装备太次，连半自动步枪都没有，尽是些七点二六和七点九口径的步枪，子弹互不通用，打起仗来很受限制。联指枪枝弹药的主要来源是地方人武部和民兵的装备，其中有好多还是日本人的三八大盖。联指为了弥补武器上的劣势，自己动手制造了一大批的手榴弹。但搞兵工毕竟不是本行，手榴弹的质量不过关，使用中提前引爆炸死了不少自己人。此外，联指还试制了一种象迫击炮的武器。用无缝钢管焊成迫击炮状，添上炸药外带一个装有钉子的炸药包。炮管里的炸药爆炸时将炸药包送到敌方阵地上爆炸，钉子乱飞有相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

两派武斗死了大概好几百人，具体的数字不详，反正各单位三天两头开追悼会。武斗的两派都认为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自然都把自己一派在武斗中战死的人封为“革命烈士”。追悼会是越开越气派，“烈士”的坟墓也建的越来越豪华。相比之下，位于柳州市大龙潭真正的烈士陵园只是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土堆。柳钢附近有个叫欧阳岭的荒山被联指建成新“烈士陵园”，山上建满了豪华气派的烈士墓。

经过“三大战役”，柳州两派打出了个分江而治的局面：造反大军占江南，柳州联指占江北。导致大批难民向两岸流动，各自逃到本派控制的地区，一片红色恐怖。柳州铁路局宿舍在江南（壶西），钢联指在那里呆不下去，职工家属纷纷逃难到柳北，一下子把各单位的大礼堂都住满了。

柳州市区风景秀丽，市内有数孤峰突起，九曲柳江蜿蜒从市区穿流而过，古有“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赞语。柳江蛟龙腾跃把市区北面画成葫芦状，成“三江四合，抱城如壶”之势，把柳州市分为柳南，柳北，壶东，壶西四大区。六八年的时候市里没几座五层的楼，几座山就成了天然的制高点。四十多层楼高的鱼峰山正對著葫芦底刚建成通车的柳州市当时唯一的公路大桥柳江大桥。这立鱼峰脚下是碧绿的小龙潭，传说是歌仙刘三姐骑鱼升天的地方。鱼峰山上有翠松亭、冠山亭、现美阁等古建筑遗址。山间有清凉国、盘古洞等7个岩洞，洞中有元、明、清以来的摩崖石刻。除了鱼峰山，柳南还有驾鹤，箭盘，马鞍三山。壶西有大小鹅山，壶东马鹿二山，柳北雀儿山。数山之中，以鱼峰山最为小巧却置为关键，是“兵家必争”之地。首先鱼峰山座落在柳扛7 b 市的中轴点上，山顶有个五米见方的平台。架一挺机关枪就可控制前面的柳江大桥及左右的飞鹅路和屏山大道，山后不出百米就是工人医院，山腰的洞里又能藏兵。造反大军占了鱼峰山可把联指和山下百姓给害苦了。山上的人每天都往山下打冷枪，谁都不敢出门。

联指为了报复，在江北架起高射炮，每天朝鱼峰山上打。有一天，山上的造反大军惹了祸，竟然把过路的解放军给打了。说是解放军却穿一身蓝绿色的军装，对国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原来这是在越南打仗调防回国的6 8 8 6部队，穿戴的都是越南人的军装。战士们在越南吃尽了美国佬B—52轰炸机的苦头，真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好不容易调防回国，本想著能轻松一下。谁知道一路上，军列让咱中国老百姓抢了好几回，临到休整地了还挨枪子，憋了一肚子的火。尽管上级有指示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可这一肚子的火总得找个地方发吧？休整了几天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各军营里除了放哨的突然空无一人，当夜柳州城里枪声大作。第二天中午部队才会到驻地，战士们一个个眉开眼笑，浑身上下都是泥。有的战士口袋里装了许多空弹壳，送给驻地附近的孩子们。孩子们好奇，问战士们昨晚那去了？有战士悄悄的回答：“你可要保密哟，我们打鱼峰山去了。”

~~~~~

【往事追忆】

内战和上山下乡 • 徐友渔 •

◇ 内战

到了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

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

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入“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

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份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

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据说，“中央文革”曾有“武装左派”的指示。不管怎么说，江青和武斗脱不了干系。1967年夏天，她在接见河南造反派组织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正式使武斗合法化。她的讲话在全国广为流传，我是从随上海《文汇报》专门附发的铅印传单上得知她的讲话的。在另一次接见中，当讲到某地武斗厉害时，她轻松地说：“小青年，爱玩枪！”确实，年轻学生中不少人是爱玩枪的动机开始的，但他们显然不爱流血和送命。

真枪实弹的武斗开始后，学校成了一小撮亡命之徒的天下，大部份学生只好离校回家。我这个“文斗司令”既不愿参加武斗，也感到和那帮舞枪弄炮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就呆在家里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小说。“红成”派的武斗司令Y粉墨登场，独领风骚。

Y与我初中就同学，学习和其他方面很一般。快到高中毕业时，他似乎一下子从冬眠中醒来，在政治上有一连串惊人表演。他依仗家庭出身贫农，一下子入了团，从此在各项活动中十分活跃。“文革”开始时，他是我校血统论红卫兵“8201部队”的骨干分子。在斗“黑帮”的时候，他最为积极，担任“劳改队”队长。每天挥着棍棒或皮鞭，殴打进入“劳改队”的干部和教师。人们随时可以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喝斥他管辖的那二十来个犯人。但好景不长，运动中他的家庭被查出问题，他的好出身原来是假的，他很惭愧地退出了红卫兵，但他已经习惯于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不甘寂寞，过了不久，他拉扯起一支造反派队伍。

Y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天赋，他枪打得准，抢了几部汽车，一学就会开，虽然几次把学校门口的墙撞坏。他敢作敢为，胆大包天，手下的武斗干将个个服他。据我观察，当一个武斗司令，除了天生的机敏和果断之外，关键是要敢于承担责任。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好勇斗狠的武斗分子，完全明白运动后期是要算账的，现在的一举一动是有人记住的，他们要找一个头领承担责任，以便自己将来不受惩罚。我记得，在还未用枪的时候，有一天我方几个武斗干将跑到办公室向M和我报告，说川大一名大学生到了我校，正与我校“八·二六”商量什么事情，看来此人负有重大使命。他们表示，想把那个大学生抓起来，但事前要与战团负责人讲好，由我们承担责任，他们只是执行任务。M和我拒绝了，于是擒俘计划没有实行。事实证明，他们的心计确实算得上远见，运动后期果然抓“坏头头”，而这些追随者都没有事。

学生有了枪确实是危险的。刚开始时，我还没有离开学校，经常看见那些人掏

出枪来打鸟，打高处的灯泡，我生怕他们误伤了人。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叫别人把一支很精巧的勃郎宁牌手枪给她看看，她问清楚了里面未装子弹，于是比划着对准一个人，假装向他开枪。不料枪真响了，子弹从这人头顶上擦过去，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另有一次，也是一伙人嘻嘻哈哈地玩枪，结果一支五四手枪走火了，子弹穿过一个武斗队员的大腿。

这时，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红成”这一派压力减轻了一些。首先，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去过一趟重庆和北京之后，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他虽然并未支持“红成”打倒刘张，但对“红成”的态度明显缓和与好转。在重庆，他明确支持“八一五”派、反对“反到底”派，而“八一五”是“红成”的亲密战友。其次，五十四军的一位政委调到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当常委，他明显地支持“红成”，并暗中支持“红成”打倒刘张。梁兴初有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似乎和成都的司令部唱对台戏。

一月下旬发生了一件有关军队的事，又使“红成”政治上轻松了一些。四川有一支属于公安性质的部队，叫独立师。一天晚上，师长杜灵和参谋长乘车经过市中心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被兵团派的武斗人员误认为是“红成”派车辆，一阵乱枪扫去，杜灵中弹身亡，参谋长重伤。该师干部战士极其气愤，迁怒于支持兵团的刘张和五十军。当五十军派人以成都警司身份去他们师部调查时，他们赶走来人，掀翻汽车。他们师还有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赶到省革筹开会的地方，要揪走刘张。虽经全力保护，刘张未被抓走，但被狠狠揍了一顿，张西挺住进了医院。“红成”派人则络绎不绝去独立师悼念慰问，大肆宣传兵团是有预谋开枪。

第二轮武斗使用枪炮，与第一轮大不相同了。在上一次，斗争的胜负取决于参战人数，而这一次主要取决于武器的先进程度，更取决于人们敢于使用武器的程度。在第二轮武斗期间，市中心仍被对方占领，但“红成”可以保留一些孤立的据点。在使用枪支之后，拿下这些据点太困难了。在重庆，新一轮武斗使局面和上一次大为不同。“反到底”派十分亡命，敢于使用重火器，最常见的是把高射炮和四管高射机枪平射，“八一五”派在有些地方被打得惨败。重庆是中国军火工业的中心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临时首都，许多兵工厂从各地迁到这里），两派把工厂中新造的，准备援助越南的最新武器用来打内战。我那段时间去过一次重庆，看见重庆大学的教学楼和宿舍墙壁上布满了弹洞。在朝天门码头，陈列了一大串死难“烈士”照片，原来这里有一场大“海战”，几艘轮船（被枪炮武装起来当作军舰）和岸上对射，结果全被击沉于江底。

在这一轮武斗中，“红成”派没过多久就处于劣势，但未被全部逐出市区。市中心的交火持续了很久，成为全市关注的战场。“红成”派的成都十中和对方控制的百货大楼在这中心地带对峙。对方逐渐扫平了十中周围的“红成”阵地，决意拿下十中。“红成”则坚决捍卫，调了不少勇敢善战的人去守卫。我最熟悉的总部勤务员之一，中医学院的Z是十中保卫战的军事指挥，他不但成功地坚守学校，还不时在附近打反击。每天都有小小的，但鼓舞人心的捷报传至总部。在大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红成”总部以十中的胜利来鼓舞人心，专门办了一份《火线战报》，报导每日战况、那时，市中心空旷无人，白天是对射和冷枪，夜晚则是偷袭。

对方恼羞成怒了，发誓要拿下十中，调来兵团中最不要命的街道工业分团实施进攻，总指挥就是团长宋立本。“红成”的阵地一天天缩小，眼看只能放弃撤离。这时梁兴初从重庆返回成都，强令两大派实施停火。3月4日，停火协议正式公布并生效。这在客观上帮了“红成”的大忙，因为再过两三天，十中就会失守。停火之后，“红成”在市中心办了一个对方的罪行展览，因为进攻者将装满食盐、粮食的大麻袋垒作掩体。“红成”宣称，内战期间成都市食品供应紧张，就在于对方的所作所为。“红成”由于“三四停火协议”在政治上占了不少便宜，但这些好处并不是实质性的。

就在3月4日这一天，有人上我家来报告说，我校司令Y在一次乘车外出时遭到伏击，被对方俘获，关押在附近一所中学。我和同伴们赶快行动起来，设法营救。我们深知，Y这次被俘，凶多吉少。我校的武斗队在远近都打出了名，他们不但打仗凶，抢东西也凶。最轰动的事件，是说他们抢了一卡车多达几千斤的腊肉。他们被对方恨之人骨，很有点恶名昭著。记得不久前我曾从家里去过一次学校，想看看有无可能恢复正常活动。当我遇到Y，正和他交谈时，一个初一小兵L赶来报告，说第三医院（由兵团派掌握，L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伙食团的人正要运载一批肉食品经过一中。Y马上中断与我讲话，要去把肉抢过来。他带了几个持枪学生，出去之后几分钟就回来了。肉自然全落在他们手中，那个三医院的炊事员吓得浑身哆嗦，连连告饶。我看不下去了，心中十分厌恶，转身就走回家去。

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与对方取得间接联系，并许诺各种条件，希望放人。但对方坚决不肯，称Y罪大恶极，定将严惩。我们虽然碰了钉子，但不能抱绝望态度，继续努力。过了几天，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要贯彻“三四停火协议”，Y获得释放。我们战团的同学，不论平时与他关系如何，纷纷前去看望慰问。

Y在城西无线机械学校（“红成”派的一个坚固据点）休养。该校门前周围一带是一大片自由市场，许多农民在那里卖农副产品。我们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进到学校。见到Y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的脸被打得又肿又黑。我虽然平时与他谈不到一块，但见此情景，仍忍不住一阵心酸。我们亲热地说话，Y仍有英雄气概，语调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

正谈得上劲，Y的几个兄弟伙计从腰间掏出枪来挥挥：“走，给我们Y司令弄点营养品补补身体！”他们去了不到10分钟，抱了一大堆鸡鸭鱼蛋进来。我一见之下，心情大变。走出门去，只见一个农民正在向Y的一个下属作揖求情：“我们全家就盼着我卖几个钱拿回去，请好歹给点钱吧！”那人把枪挥了几下，说：“再罗唆，我毙了你！”这个农民算胆大的了，其他遭抢的人根本不敢跟进来恳求。但他见此情况，还是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了。我没有回去向Y告别，径直走回家去。

当我前去看望Y时，我内心充满了同情。但我一到那里，只感到那是一窝土匪。我感到和他们同属一个组织真是可耻。在我心中，这些人是流氓和强盗。他们是“红成”和“八·二六”中正派学生的共同敌人。

只过了半个月，Y就报了一箭之仇，洗刷了他被俘虏的耻辱。身体很快复元之后，他恢复了活动。一天，他带着两个下属在学校附近逛荡，只见前面一辆豪华轿

车停下来，从车中走下一官两兵，以及一个肥胖妖娆的女人。那个头头是大名鼎鼎的宋立本，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团长，据说以前被监禁和劳教过几次。他知道他在运动后期要被收拾，抱着豁出去了的心理，打仗不要命，干其他为非作歹的事也无所顾忌。Y挥枪走上前去，对方也刷地拔出枪来。这时枪对枪，两个威震四方的好汉四目相对，形势千钧一发。宋喝叫道：“你们动一动，我就开枪，我的枪可是连发的！”Y冷笑应道：“我的枪是20响，手一扣你们全没命！”对方全是短枪，而Y的下属手持冲锋枪。最后，宋立本软了下来，他放下枪，甘当俘虏，跟Y来到我校。这真是一场比谁更亡命的心理战，不知那个胆大包天。无恶不作的宋为何在关键时刻软了下来，也许，我听的故事有些夸张。

宋及其一伙被带到学校，免不了受到拷打。他们把他那个秘书兼情妇放到井台轱辘架的桶里，朝水中放下，说要淹死她，吓得她又哭又叫，上边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宋立本是大人物，Y怕将他关在我校，对方会来营救，于是将俘虏全部押解到成都大学，那里是安全的根据地。在那里，宋被活活打死。由于官方认为他是在运动中兴风作浪的阶级异己分子，在运动后期这件事没有深究，Y他们也未因此事而受惩罚，虽然毕竟死了人。

◇ 上山下乡

1968年秋天，毛泽东发出了新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每一个中学生，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每个人（独生子女和病残者除外），全都必须去农村。上级没有解释，为什么运动中的革命先锋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及，如果有必要接受再教育，为什么不去工厂接受工人的再教育。

动员下乡是半强迫性质的，大部份人不愿意下去，但还是在不断的号召动员下去了。少数人抗拒了一阵，但他们的父母因此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作单位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受到很大压力，最后不得不去。当然也有少数漏网之鱼。

我是欣然前往的。我在“文革”前就有极其充份的思想准备要下乡，我在毕业前夕曾向班主任正式提出，要放弃考大学的机会，直接到乡下去。从1968年夏季我就开始锻炼身体，以适应农村艰苦的体力劳动。我还到成都附近老知青那里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并准备了下乡阅读的书籍。我不像一般人那样恐惧下乡，当然，我的动机既不是去干革命，也不是去受再教育，而是逃避政治迫害。

这时，学校中对于造反派的压力又大起来，我们几个造反派头头和工宣队达成一项政治交易：我们带头下乡，以此帮助他们做好动员同学下乡的工作，他们则在政治上保护我们，抵制军宣队对我们的打击。另一方面，造反派和前保守派有一场政治表现上的竞争。几个前保守派骨干率先写出报名下乡的申请和充满革命豪情的决心书，他们宣扬说，到了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还是他们革命。我们不甘落后，马上搞了一个二十多人签名的决心书。事实上，那些原保守派人士家里都有权力和关系，下乡之后，那批贴出第一张申请的人中，许多马上就到部队或其他工作单位去了。

成都一中下乡的地方是四川省绵阳地区安县，在四川西北部，距成都大约200公里，是丘陵地区。学校革委会、军宣队和工宣队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小组，下去摸情况。他们回来之后把那里描述成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用校革委主任W在报告中的话说，他们一路上只看见“白鹤、鹭鸶、点水雀”，似乎那里比公园和动物园还好玩，说得一些同学恨不得马上就动身。

我们担心，军宣队在政治上没有整倒我们，在下乡分配时会利用最后一次机会搞鬼，把我们分到条件最坏的地方，而把最好的地方分给他们喜欢的人。我们打听到了他们将用一个通宵在某间办公室突击进行下乡分配工作，我们几个人溜到那间办公室外面，一直密切监视他们。不出所料，他们确实在报复我们。一个同学带头冲进房间，指责他们，军宣队的人无言以对。这时已是半夜，他们困倦极了，居然同意让我们替他们干。我们干起来又快又好，因为其中一个头头管战团组织工作，对全校同学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干完了他们剩下的一半工作，于是两方皆大欢喜。我们警惕性很高，帮他们抄写名单，直到张榜之后才放心而归。

下乡是自愿组合，我和初一的三个小女孩在一起。这个组合颇为奇特，曾有人劝我，说带三个小女孩负担太重。其实我们在一起是十分自然的，我从参加“红野”第一天起就认识她们，在整个运动中，她们给予我特殊的信任。不论形势多么恶劣，不论我面临什么样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惩罚，她们都毫不动摇地和我站在一起。在长时间内，她们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不放心她们和别人在乡下生活。下乡后，我们在经济上实行公产主义，不分彼此，这是许多学生想做而不能坚持到最后的。

1969年1月25日，我校同学乘火车开赴农村。告别生活、斗争了许多年的蓉城，即将奔赴一个陌生、艰苦的地方，大家心中都不是滋味。这天寒风凛冽，天色阴沉。火车启动时，许多同学和送行的家长都“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加速的列车很快就使同学们再也看不见自己的父母，大家坐在车厢里沉默无语。我的心情与大多数人不同，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苦，我预先知道得比他们多，但我作好了准备去承受一切。我宁愿受恶劣自然条件折磨，也不愿陷在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的漩涡中不能脱身。

在农村安顿的过程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原“红野”的一大帮人分在一个平原上的公社，刚呆了两三天，还没有去干活，我的三个小伙伴就想到几里外另一个公社去探望她们的一个好朋友，我陪她们一道去。三天之后回来，发现所有的同学全搬走了，我们大吃一惊。有人悄悄来通知我们，这个地区有很多麻疯病人，但当地人太落后，根本不当一回事，我们的一组同学甚至被分配到与一家麻疯病人同住。陪同我们下乡的老师坚持要让我们换地方，而当地政府不同意。那个在运动初期被批判得十分厉害的地理教师L，冒着风险对这一带麻疯病患者的分布、生活习性和活动情况作了周密调查，他说：“我老了，染上病不要紧，我要保证我的几十个学生的安全。”他的调查很有说服力，当地政府只好同意我们换地方。为了不伤害当地农民的自尊心，领导安置的军宣队、工宣队谎称学生需集中学习，将人们迅速撤离。

我迅速赶到区政府所在地，看到有五六十人呆在这里。同学们高兴和激动地迎接我，并告诉我这里的形势十分微妙和紧张。原来，军宣队的那个副队长W从来都想整我们，但一直未成功，在这次迁移中又出了什么坏主意和我们这批人过不去。他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公愤，同学们半夜冲到他住宿的招待所，要揍他，吓得他直打哆嗦。同时，一部份年纪小的同学发现乡下和领导们先前描述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再加上又因麻疯病迁移，思想上乱了套，想家想父母了，吵着要回去。W趁机诬蔑这些人闹事是想回城，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同情我们的工宣队员悄悄透露消息说，W一方面稳住学生，一方面打电话和县革委会联系，叫公安局来抓人。

事不宜迟，必须当机立断。我马上告诉大家，想回城是不可能的，户口已经下到农村，我们就不再是城里人了。另外，县公安局的人就要出发，我们还没有返回成都，半路上就会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抓回来。我建议说，在我一路找他们的时候，我发现所经过的一个公社条件不错，不如主动要求迁到那里。这样，政治上就争得到主动，也预防W使坏，把我们安置到条件恶劣的地方。大家马上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立即将决定通知军宣队和工宣队。事情有了一个妥善的解决，除了W想整人又一次落空外，各方面都松了一口气。

我们最后安置在远离原地的乐兴公社，我在双河大队一生产队。我们四人住进生产队最富裕、最乾净的一户农民家中，开始时和他们一道吃饭，一周后自己开伙。我很快就在劳动中、交谈中、会议中对农村作了一番大致了解。知道要下乡时我就计划了解农村的现实情况，而且相信有一条简捷途径。由于全国整齐划一地学大寨，政策是一刀切，因此，研究一个地方，对全国的情况也就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我所在的生产队共有30多户人家，一百六七十口人。人均耕地两亩三分，这在四川算中等水平，我曾去过四川乐山地区，那里的农民人均四分地。我队强壮男人每天挣的工分合人民币五角，和我在一起的那几个小女孩每天挣的工分约合三角五分，在当时能买一公斤半大米。每个成年人全年的口粮、食油等东西折合成现金为70多元。生产队最富裕的人家，扣除口粮费用，一年能收入50元左右，这种家庭大约只有三家，一般是不进钱也不倒找。有七八家人需要倒交钱才能取得口粮，因为这些家庭或者是小孩多，或者是大人生病，挣不够基本定额。能进钱的家庭基本上没有拿到过现金，因为总有人家欠款又无法交清。全生产队只有一户人家有半导体收音机，因为他们家的大女儿在外面当教师。口粮分配和出工量相关，每个成年人每年平均分到的粮食折合成大米约为280公斤，其中一半是稻，一半是红薯，这在全县算较高水平。按国家颁布的照顾知青的政策，我们每人按全队最高标准分配口粮，这个标准对于我们足够而且略有结余。不难看到，在土地和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到来降低了农民的口粮标准。在其他公社，有些同学的口粮收入只有我们的一半，每当粮食告罄，他们就四处游荡，到我们这里来打秋风。蔬菜基本上靠自己种，我们每人分到三分自留地，我把它经营得超过了生产队的农民。

农村的“文革”运动也搞得很厉害，但比城市里晚一拍儿。我们刚到时，这里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大队部里每天都在打人，被捆被吊的多为造反派骨干分子。过了不久又是“反复旧”，造反派回过头来报复，吓得公社、大队一级干部四

处躲藏。当地干部和造反派都试图拉知青与他们结盟，但我们坚决地置身事外。

农村的干部不怎么得人心，他们往往利用职权，占集体的便宜。我所在的生产队本来有一位极能干的队长，他身材高大，干活卖力，但在四清运动中下了台。现任队长家里孩子多，妻子生病，是生产队里最穷的人家之一。由于他是队长，生产队的困难救济他总是占第一名。干部最招人不满的是他们开会太频繁，开会不干活，照样拿最高工分。学生刚下乡时，暂时还享受了几天特殊待遇，和大队、生产队干部一道在公社开过几次会。开会期间自己带米带柴，一个大队的人找一户人家升火造饭，而公社则给每人补助半斤猪肉。说来也真是可怜，这些干部们一到吃饭时间就乐得眉开眼笑，这种有肉的饭食，他们一个月也未见得有一次。大队和生产队有少数有利可图的工作，比如当赤脚医生，医疗站的卫生员，小商店的售货员，管理抽水机、打米机的技术员。这些干活轻松，工分拿得高的位置，一般都被干部本人或他们的子女占据。念高中的名额很少，也是分配给了干部子女。干部文化程度很低，经常带头干一些愚昧落后的事，比如我们大队的队长T，家在我们所在的生产队，他的妻子生了病，他请一个巫婆在他家跳大神。他怕我们知青造他的反，专门挑我们不在生产队的日子才把巫婆请到家里。他没有钱付给巫婆，事完之后让她抱走一只又肥又大的公鸡。他的妻子基本上是每年生一个小孩，到他家里去，只见地上爬了一大群孩子，就像进了猪圈一样。他妻子体弱多病，不参加劳动，若不是靠着大队长这个位置，他家根本无法生活下去。

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完全出人意料，我们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虽然两年多的运动使人对原有的政治信念产生动摇和怀疑，但有些东西仍然是根深蒂固地保留在脑子里，比如“新旧社会两重天”，“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这一类宣传。到农村后，这些神话迅速地破灭了。同学们怀着惊奇的心情，纷纷交换他们的所见所闻。

首先是吃“忆苦饭”。“我们在城市早就听闻过这种阶级教育活动，但从未亲身经历。它的本来宗旨是这样的：人们在新社会过惯了甜蜜的幸福生活，会逐渐忘记“解放前的苦日子”，这样就会忘本，即忘记共产党是恩人、是救星，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吃“忆苦饭”就是组织起来，强迫大家吃一餐旧社会吃的那种与猪狗食一般的饭菜，它虽然使人难受，但提醒人们比较新旧社会的甜和苦。在吃忆苦饭那天，学生们以激动和紧张的心情准备着，暗自下了决心，饭再苦，也得把它吃下去，不能让贫下中农看我们的笑话。这种饭对我们而言确实难于下咽，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农民们吃得欢天喜地，像过节一样喜庆。我们浅尝辄止，表示能吃就行了，而他们吃了一碗又一碗。问起来，他们说这是难得的免费招待，吃少了岂不吃亏？

然后是开“忆苦会”，这种会议的宗旨与吃忆苦饭相同。会上让那些所谓“苦大仇深”的老人们讲他们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所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年轻一代听了，就会受到教育和启发，决心跟共产党走，不让那吃人的旧社会复辟。但令我们大惑不解的是，干部们在会前向老农民反复交待，忆苦不要忆错了时间，要讲1949年之前的苦，不得讲1962年的苦。尽管如此，那些头脑不清的老人们一大半还是讲起他们在1962年的遭遇，讲那时饿得多难受，饿死了多少人。由于“文革”中的宣传，他们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刘少奇。他们忆苦忆得热泪纵横，急得

干部大叫：“叫你们忆蒋介石的苦，不是忆刘少奇的苦！”

这些干部在会上装正经，而平时说话就很不注意。我听过不只一位生产队长（都是党员）抱怨目前生活太苦，他们缅怀以前给地主干活的日子。那时，在栽秧打谷的大忙季节，他们一天可以吃上五顿，大碗的米饭，大块的肉，外加汤元之类的小吃，有时甚至是地主太太亲自盛菜端饭。事情很简单，“要想马儿跑，就得添够草”。他们喜欢那种大干大吃的日子，不喜欢现在这种干活不卖力，吃不上好饭菜的生活。

当地生活中的一大困难是缺柴烧，我所在的大队树木在全县算最多的，但仍感困难。树木每年生长一轮新的枝杈，人们每年逐棵拉扯下一杆旧枝杈，每棵松树都像电线杆，只有顶尖部有三五个枝杈，很少见到枝叶繁茂的树木。妇女、小孩每天背着背篓，手执柴耙，把落在地上的乾枯松针梳扒得干乾淨净。这些都是柴草极为紧张的表现，但农民告诉我，叨多年前，这里大树参天，密得不见阳光，常有野兽出没。但大跃进时大炼钢铁，把树林全砍光了。生产队给我们盖房子，想找几棵碗口粗的树木都办不到。

干活时，农民常常指着某个田边地角，告诉我原来那里住着一户姓什么的人家，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家人都饿死了。这种事情听多了，我粗略估计了一下，生产队饿死的人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在大跃进年代，种庄稼要深耕密植，这是毛泽东下令推广的。生产队干部不照办，就被抓到公社，吊在屋梁上打，直到同意为止。一年下来，那些密植水稻只长秆不结穗。种红薯、土豆，要求深耕至一米以上，而且命令晚上也要打着灯笼火把干。全大队的人拥到一个地方干活，以求声势壮观。连干几天，人们累得白天也不能动，只想睡觉。办集体化食堂时，干部把农民每家的锅全给收缴了，把人一律赶进食堂吃饭，开始时敞开肚子随便吃，后来每天只有一二两。农民受饿不过，偷点田里还未长成熟的粮食或蔬菜，悄悄在家弄点饭食。但干部把人盯得很紧，一见哪家房顶冒出炊烟，就带着民兵去抓人。

这就是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的成果，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受到的再教育真是大有裨益。

农民一般不知团结，胆小怕事。几个胆大妄为的知青，只要把匕首晃一晃，就可以在一大群农民中横冲直闯，所向无敌。农民迷信知青的威力，我有一次曾被召去替他们当敢死队员。我下乡那年夏天，当地遇到大旱，全县只有一条水渠供水，上流的人截流断水，我们下面则田地乾涸。这时刚插完秧子不久，事关下一年所有人的口粮，大家急得不行。大队从每个生产队抽调几名最精壮的汉子，组成一支二三十人的突击队，到上游去开闸放水，但要我和另外的知青打头阵。想到全大队一千多口人来年生计，我们同意了。我们走在队伍前头，溯渠而上，清沟理石，让主流通畅，直灌下游。若遇人阻挡，自然是知青带头上去交涉。若对方人少或胆小，便依我们。若实力不相上下，便举行谈判，让水一分二流。走到最上游，发现水全给挡往另一个支渠，灌了那里的田地。我们知青带头跳到沟中搬石板，把水朝下游放。这时当地一支队伍出现了，我们跳上岸，做出应战的样子。但是，对方队伍黑压压一大片，少说也有一两百人，其中个个身强力壮，手持锄头或扁担，杀气腾腾。看到实力对比如此悬殊，我们只有自认倒霉，听任他们把水全引入自己田里。据

说，这个公社从来都是抢水最凶的，前一年武斗高潮时，他们在水渠分流处架上机枪，谁也奈何他们不得。

马克思曾说过，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这话看来相当有道理。从学生变成下乡知青，好些人的道德面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们在学校时规规矩矩，现在完全成了另一副样子。我曾和几个同学进饭馆吃饭，他们临走时把碗、碟、盘一股脑装进自己的口袋。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说现在大都这样。我还看见有人在集市上拿走农民的鸡蛋、水果不付钱，如果农民坚持讨要，他们就掏出匕首晃一晃：“老子只有这个！”还有人变成小偷，他们说，掏农民的钱袋比在城里容易得多。但他们没有想过，农民丢了钱，后果也比城里人严重得多。有个农民刚卖了一头肥猪，转眼间钱袋就被一个知青小偷掏去，他八方寻找，毫无结果。那笔钱是他全家一年中惟一的清 b 金收入，他简直不敢回家报告这飞来横祸，嚎陶大哭一场之后自杀了。他的妻儿老小以后怎么过日子，这是一个令人不敢多想的问题。

我当然知道，知青的反常行为多半不是出于真正的堕落，而是对前途无望的表现。我们正处在生命中的黄金季节，但却像垃圾一样给扫出城市。聪明好学的人被剥夺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满腔热血，一心报效祖国的人只能改造自己。没有人能明白，为什么把人驱赶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就是革命，为什么党和领袖的关怀只表现为强迫人到一个不熟悉、不适应的环境中去。应该说，大多数学生还是不错的，他们尽量与农民搞好关系，尽量多干些农活，并尽可能多看些书。但干活有什么用？劳累一天不过够买几支冰棍。看书有什么用？上学不可能，工作上用不着，瞻念前途，一片茫然。能严格要求自己的人最多也不过是洁身自好，但精神上悲观失望，得过且过；管束不住自己的人则自暴自弃，他们去偷去抢，打架斗殴，寻欢作乐。他们并非存心变坏，这不过是一种绝望的发泄。

下乡之后，大家和以前一样喜欢聚会，十多个人在一起做饭吃饭，好歹有一点热闹的气氛。饭后大家一起唱歌，一支接一支，没完没了。“孤苦零仃四处漂泊，我看这世界像沙漠，四处空旷无人烟，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惘在那黑暗当中……”电影《流浪者》中的主题歌抒发着知青心中的愁苦。聚会毕竟是短暂的，深夜归队，第二天仍要重复那单调乏味的劳动和生活。

几乎每个人都爱跑回成都。当自己不再是成都人之后，才发现城市是那么值得留恋，广场是那么宽阔，柏油马路是那么平坦笔直。真不愿意再返回那贫瘠的乡村，但最后仍不得不回去。父母或是正被批斗，或是面临去五七干校，进学习班。一家人个个心情不好，免不了情绪烦躁，言语不顺。更不用说在家呆久了，“革命大院”的积极分子会来过问，动员人及早回乡。

~~~~~

#### 【理论探索】

#### 从“湖南农民运动”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许向阳 •

目前，国内知识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认为在实行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是左倾思潮。1998年初，由“今日中国出版

社”出版的《交锋》一书，描述了自1978年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所发生的三次大的转变〔1〕，指出每一次转变都是在和左倾思潮的交锋中取得胜利后才实现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共的政策在原先的向度上通过自我革新持续地进行了三次右转。

既然人们都在大谈反“左”，谈“左”是主要的危险，谈在未来将要持续进行的思想解放进程中，“左”依然是最大的阻力。那么，这个“左”究竟是什么呢？这种思潮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根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有着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在从执政党的领袖〔2〕到普通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说要反对它的情况下依然威势不减呢？显然，对极左思潮的严肃分析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儿，我们只是尝试着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左倾思潮走向极端走向高潮的产物，因而按理说来，要认识极左思潮的特征，似乎最简洁的方法是直接去分析“文革”，但是，一种没有对比的孤零零的观察并不能使我们抓住纷繁事物中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暂且将“文革”搁在一边，而来看一看在1926年的湖南爆发的那次农民运动，因为，就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的那样，它是后来那场在20世纪中叶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农民大革命的一次预演，可以说后来的革命中呈现出来的一切基本要素和精神特征，在这次预演中都有着具体而微的反映。而且，正因为当时的农民还没有和左翼知识分子结合起来，还不知道用西方的革命理论来规范和装饰自己的行为，这也就使其行为带有更大的原发性和真实性，所以，从中也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场农民革命的最具本源性的精神气质。

我们看到，骚动不安的湖南农民自发地成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农民协会之后，立刻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在乡里实行了全权专政。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道：“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为所欲为”，“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3〕“翻身”后的农民，立刻本能地将乡村中以大中土地所有者为主要代表的有产者和有文化者作为其专政对象，在一种愤怒和忌恨的目光之下，将其“妖化”为“土豪劣绅”。而革命中的农民对付其专政对象的手段除了枪毙〔4〕、关进监狱、罚款、逼其捐款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以下这些最能反映其内在气质的斗争方式：质问。这是一种针对较轻的“罪状”〔5〕的惩罚手段，“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质问，最后的结果是以写检讨书和保证书了事。大示威。“统率大众……在他家里吃饭。”“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在毛泽东的家乡湘潭的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6〕游乡。“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7〕。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8〕

凡此种种，归纳起来就是“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将其打入另册，在这种情况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结果造成了农村民生的凋蔽，湖南全省的财政都发生了困难。

而赶走“阔人”之后的农民，在经济上仇恨商人，既不准谷米出境，又不许工业品入内，力图将洪水猛兽般的商品经济挡在境外，安安稳稳地永远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文化上则反对一向“痛恶”和“看不惯”的正规学校，讨厌学校教师，因为“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总之，他们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地盘上清除异己的东西，然后，好关起门来不受打扰地建设自己想象中的天堂。而他们建设天堂的基本方式也就是要消灭掉一切自己觉得刺眼的看不惯的事物。于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各种禁止运动。

这些禁止运动，除了禁牌、禁赌和禁鸦片之外，所禁的还有：○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轿子。因为“农民最恨坐轿子的。”○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纷纷倒闭。○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鸡鸭。“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养。○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此外的禁令还有许多，从“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新春贴瑞签”到“禁做道场”，“禁放鞭炮”〔9〕不胜枚举。

不难想象，在这样严厉和细密的禁令之下，牌、赌、鸦片是绝迹了，但每个个体的吃、穿、用、行、娱乐、宗教的全部日常生活都将完全处于一双嫉妒和凶厉的毒眼的全面监控之下，彻底丧失欢乐和自由。

凡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在经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这些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这两者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式之间令人惊叹的一致性，以致于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那场农民革命以及以后发展到“文革”爆发的整个历史，都只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延续，是它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方式更为剧烈的一次重演。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事实上是压抑在广大下层民众心中的极左激情——要摧毁一切压在他们头上让他们显得无价值的事物的冲动——在上层政治人物煽动下的一次大宣泄和大爆发。因而，“文化大革命”从其精神气质上来看是一场充满着最深刻的卑贱意识的嫉妒的大革命。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普遍的嫉妒，但在正常情况下它总是受到文化与法制的压抑和控制。但在发生极左革命的情况下，嫉妒却被合法化，乃至在一种乌托邦前瞻中被神圣化了。而这种被神圣化和合法化了的嫉妒，不再阴郁地囿于个体的内心中折磨自己，相反它升腾到地面上，化为一种公开的意识形态话语，妖化自己的嫉妒对象，并且将自己的嫉妒强化为仇恨，进而强化为消灭嫉妒对象的暴力行动。

分析一下“文革”中的专政对象，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支撑这场革命的激情是一种嫉妒的激情。这种嫉妒包括对财富的嫉妒（富裕等同于罪恶，贫穷等同于正义），对权力的嫉妒（一切当权者都是走资派），对知识的嫉妒（一切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对美和性的嫉妒（一切美的事物和美的感情皆成禁忌），对欢乐的嫉妒……这种嫉恨的激情异常广博，无所不包，它渴望通过摧毁一切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积极价值来达到自身的狂欢。

“文革”除了其内在精神，在外在形式上也和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次农民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文革”的口号中，最具威慑力的一句就是“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它同样也是在群众运动的狂潮中将自己的革命对象妖化成“牛鬼蛇神”，通过全面专政来造成恐怖气氛。从其处罚“敌人”的基本方式：许多人一涌而起，将人活活打死；把人关进“牛棚”；头上戴高帽子，胸前挂牌子游街；在人群面前批斗；抄家，没收家产；写检查，写悔过书等。到各种禁令和禁忌：禁绝自发的商品交换；禁种或限种自留地；禁养或限养猪和鸡鸭；禁绝任何“封资修”的艺术样式；禁绝种花、养鱼、听音乐、穿“奇装异服”（10）等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直至厌恶和痛恨一切形式化、系统化的知识，厌恶正规的学校教育，仇视知识分子，拿教师开刀等等，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出自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其想乾净彻底地剿灭一切看不惯的事物和思想，建立一个“红彤彤”的理想世界的意愿，一直到其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都对在其40年之前发生的那场农民暴动有着直接的继承性。假如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前者那儿还是具体而微地潜存着的一切，在后者那儿已经彻底地爆发出来，发展到了其逻辑的终点。它最后所得到的平均主义乌托邦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个体随时都可能因言谈、举止乃至服饰和发式的不慎而招来斥责、批斗直至杀身之祸，人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切自发和优美的情感，渴望自我实现的冲动都遭到了无情的压抑和打击，只有两种激情被允许尽情宣泄，那就是渴望摧毁他人的自我实现意志和彻底击垮任何高贵意识的嫉恨冲动以及在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中完全捐弃自我的献身冲动，结果，在这两种激情的统治下，十亿中国人民终于变成了一群穿一样的衣服，喊一样的口号，手挥“红宝书”而相互噬咬的蓝蚂蚁。

所以，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我们看到，左思潮从心理根源上来看，是一种被极度强化了了的卑贱意识，这种卑贱意识起源于无价值的自我与有价值的他人之间的遭遇。无疑这种遭遇总是会对自我产生巨大的刺激，在这种刺激之下，一种正确的高贵的姿态是，对自己的不利处境进行清醒的反思，敬仰和学习他人所代表的价值，然后发愤图强，通过认真严谨的不懈劳作来切实提高自身的价值。而一种怯懦和卑贱的态度是闭眼不承认他人所拥有的价值，而在自己所构成的虚幻梦境中苟且偷安。极左思潮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积极的卑贱意识”（积极的恶），它不仅仅在内心里不愿承认他人所拥有的价值，而且，公开表示对价值的蔑视和对价值创造者与拥有者的仇恨，这种思潮的最高表现就是依靠卑贱者数量上的优势对嫉恨对象执行武器的批判，在用暴力摧毁现存的价值秩序和消灭价值创造者的过程中宣泄压抑的情感来实现自身的狂欢，而“七、八年来一次”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正是这么一种不断煽惑大众“积极的卑贱意识”，通过一次次以群众暴力推翻在生存竞争中自然形成的价值秩序的革

命来无限追求极度狂欢的理论。（11）

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极左革命之间存在着的距离，在马克思那儿，革命的合理性是需要加以论证的，他所提倡的工人阶级的革命从理由到目的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即认为私有资本的发展必然以牺牲工人为前提，而计划经济可以克服经济危机解放生产力等）而他论证革命合理性的这种经验特征（12），使他的理论在客观上还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一旦发现他对事实的预言和历史的发展不一致时，势必只能接受他人的批判和修正（13）。而极左革命则不需要任何理由，精确点说是它不需要任何理性的客观的理由，而只需要内在的心理的理由。只因为我卑贱、我压抑、我愤怒、我仇恨，所以我就要革命，只因为我渴望一种残酷的令人战栗的狂欢，所以我就要革命。

革命不再具有任何现实的合理目的，而纯粹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心理宣泄的需要，一种图腾，这也就决定了极左革命的激情完全是独断的，这种专断的激情从它升起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它绝不会接受任何的理性批判，相反，在发动之时，它就早已下定决心要和任何的批判者进行“你死我活”的决斗。

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理论，为什么在欧洲经过批判和修正发展成了各种富有建设性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在中国却流变成了极左革命，这是一件很值得深思的事情，它除了是由于文化渊源（14）的不同之外，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革命的主体是亿万传统农民。因而，在我们探讨了极左思潮的心理根源之后，还应该再探究一下它的社会根源。为什么极左思潮在现代中国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显然，这和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格局中的处境密切相关，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个体的卑贱意识是在无价值的自我和有价值的他人遭遇之际最易被激发出来，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可以说在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时时面临着这样痛苦的刺激。特别是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在突兀而来的工业化浪潮（15）击下，经济上“十村九困，十家九穷”（16）入完全破产的境地，在精神上则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世世代代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价值信念彻底崩溃。传统农民在纯粹的直接经验中所获得的那点知识，完全无法对应这“千古未有之巨变”。当然，不仅仅是农民，也包括手艺人，知识分子和个体经营者，可以说作为弱势民族中的几乎每一个成员，在中西文化的巨大位差之下，在文明碰撞所引发的社会大动荡中，都会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显得那么渺小和毫无意义，终于会对用自己的理性去把握这个多变的世界，用自己的力量去开创事业丧失信心，而深深地陷入焦虑和恐惧之中，变得绝望和无所适从。当然，一个个体不能容忍自己永远处在这么一种软弱无力的绝望之中，他渴望变得强有力，而既然已经丧失了创造的能力，那么他能够为自己选择的唯一的强有力的姿态就是仇恨，他在仇恨中寻找和制造自己的敌人，他要弄清楚究竟是“谁”——而不是客观的情势——将他置于如此不幸的境地，他要复仇。

显然，当一个社会中的现实状况——构成这种状况的除了政治经济形势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民众所受的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使得生存其中的大多数民众都无力选择创造而只能选择攻击和仇恨作为表达生命的方式时，这个社会就会成为源源不断地滋生出极左思潮的温床。

遥想1000年之前的盛唐之音，那时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如此地自由、安宁、

高贵和阔大，因为，我们在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浪潮——农业化浪潮中登上了高峰，成了当时世界的文明中心。然而，祖先的成就终于成了子孙的包袱，当第二次浪潮——工业化浪潮在全球兴起时，因循守旧和颀颀自大使我们不仅仅无法和作为工业化浪潮发动者的西方民族相比，即便是在非西方的后现代化民族中，也成了成绩最差的一批学生。现实世界中地位的不断恶化，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品位也不断降格，终于堕落成了一个以嫉妒、仇恨和虚夸、傲慢作为主流精神的卑贱的民族。而正是这种内心世界中夜郎自大的虚夸的傲慢和外在世界中样样不如人的巨大反差最容易激发出一次又一次的旨在摧毁一切外在价值的极左革命的狂潮。

注释：

〔1〕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搞经济建设，以及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私营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份。

〔2〕邓小平多次谈及反“左”，并在《交锋》所提的三次转变的前二次中起了核心作用。〔3〕《毛泽东选集》第14页，第16页。

〔4〕这是农民对极右专制的最严厉的报复。

〔5〕我们之所以在“罪状”上打引号是因为这种“罪”的产生不是通过实证的方式，由司法程序判定的，而是由大多数人的情绪——“民愤”确定的。因而，我们将这种仇恨情绪的投射过程称为“妖化”。

〔6〕《毛泽东选集》第16页，第24页。

〔7〕可参阅毛泽东诗句：“黑手高悬霸主鞭。”

〔8〕《毛泽东选集》第18页，第25页。

〔9〕上述农民诸禁的内容，皆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5～37页。

〔10〕“文革”时的服装，除中山装、军装之外即为“奇装异服”。毛泽东有诗云：“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11〕近几年，国内有些学者将中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其实，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比法国革命具有浓郁得多的卑贱色彩，法国革命中虽然也夹杂着卑贱意识，但它的主旋律是高贵的，是对个性自由与人类平等博爱的追求。而中国革命，则从一开始就是以对自己敌人的仇恨作为推动力的，它强调的不是个性自由，而是用纪律束缚个性，追求的不是人类平等而是用自己所属阶级对别的阶级实行专政。即使是和俄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的非理性的极左色彩也要更浓郁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俄国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快速地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人在计划体制下却成就甚微。简而言之，中国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整个人类历史，提供了极左革命的可供研究的最为完整的典型，当然，从实践后果的惨烈程度来看柬埔寨的波尔波特革命也不比“文革”逊色，但“文革”独特的研究价值在于，它除了涉及的范围更广，内容更为丰富之外，它还为人文化史贡献了一套完整的极左革命的理论，这也就是我们上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2〕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作《资本论》，就是力图想科学地经验地完成这种论证，而他在写作过程中，一直不断地受到自我批判与自我怀疑的折磨，以致使《资本论》迟迟不能定稿。

〔13〕事实上，在共产主义的故乡欧洲，这种理论正是在这种开放地接受经验批



（14）想了解极左革命的文化渊源的读者可参阅刘小枫的《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和《臆说纬书与左派儒教士》两文。《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3～596页。

〔16〕参见薛暮桥《中国农村中的基本问题》载于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第820～827页。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